

知识分子图书馆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罗 钢 刘象愚 主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美)赛义德等著: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

(知识分子图书馆/罗钢,刘象愚主编)

ISBN 7-5004-2432-9

I. 后… II. ①赛… ②陈… III. 文学流派,后殖民主义-研究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5686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625 插页:4

字数:425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27.00 元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FF7P/07

《知识分子图书馆》部分书目

- 文学行动* 雅克·德里达
- 解构之图* 保罗·德曼
-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 斯坦利·费什
- 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 莫瑞·克里格
- 快感：文化与政治*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布莱希特与方法*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论解构* 乔纳森·卡勒
- 重申解构主义* 希利斯·米勒
-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 冈特·绍伊博尔德
-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罗钢 刘象愚主编
- 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谢少波
- 后革命氛围 阿里夫·德里克
- 赛义德自选集 爱德华·赛义德
- 政治无意识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特瑞·伊格尔顿
- 历史和人文科学中的历史 拉尔夫·科恩主编
- 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 布鲁斯·罗宾斯
- 后现代性的起源 佩里·安德森
- 吉尔·德勒兹：哲学戏剧 米歇尔·福柯等
- 介入的区域 佩里·安德森
- 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佛克玛主编
- 性贸易及其政治经济学 《社会文本》编辑部
- 本雅明文选 瓦尔特·本雅明
- 狱中札记 安东尼奥·葛兰西

(注有*的已出版。)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萨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萨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桦、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 10. 于北京

前 言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如同六十年代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形形色色冠以“后”字前缀的“主义”一样，后殖民主义也是一个含义丰富，颇难界定的词。按照德里克的概括，仅“后殖民”一词就包含下面三种重要的意思：“1. 对前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实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2. 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3. 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①在上述三种意义中，第三种才是我们所谓的后殖民主义。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明，那么我们对“后殖民”一词的范围便有了一个基本的界定，无论在德里克所说的哪一种意义上，“后殖民”都应该理解为“殖民主义之后”。但这个“之后”与“之前”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是“之前”的历史延伸。因此，尽管后殖民主义跨越了众多学科，从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人

^① 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美国《批评探索》杂志1994年冬季号，中译文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46—44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类学直到艺术史和文化研究；尽管后殖民主义研究涉及到众多的问题，如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的关系等等。尽管后殖民主义内部包容了众多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如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以至于很难把它看作寻常意义上的一种统一的“主义”。但所有的后殖民主义话语都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各种后果”^①。

后殖民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只是近十几年间的事。虽然有学者把它的源头追溯到二十世纪一些黑人思想家，如赛萨尔、詹姆斯、法依、赖明等人，但对后殖民主义的发展真正起了直接推动作用的，是1978年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该书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发了对后殖民主义问题的广泛思考。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欧美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纷纷出版了讨论后殖民主义的专号，在欧洲和北美相继召开了一系列与后殖民主义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逐步把后殖民主义研究推向高潮。1989年，由阿什克罗夫特、格里菲思和蒂芬合著的《逆写帝国》，是应教学需要编写的第一部系统介绍后殖民文学理论的导论性著作。1993年出版的由威廉姆斯和克里斯曼合编的《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则是第一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读本。它们把后殖民理论带入了欧美大学的课堂。目前，后殖民主义已成为继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思想界又一重要的思想潮流，其影响仍在与日俱增。

根据其不同的理论背景，我们可以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内部区分出三种流派，一是由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这是后殖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所以有学者把他们三人戏称为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二是以莫汉

^① 阿克克罗夫特等编《后殖民研究读本》导言，1995年英文版。

蒂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这派理论家关注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境遇，并从这种立场出发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三是以阿赫默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他们一方面以第三世界理论家的姿态批评西方白人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三世界文化问题上的主张（如阿赫默德对詹姆逊的著名批评）；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挑战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他们之间的论争构成了后殖民主义内部最富于戏剧性的理论张力。当然，上述的划分只是粗略的，相对的，有的标榜“异质性”的理论家，如斯皮瓦克就兼具多种理论背景。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掌握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我们选编了这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五篇论文围绕“东方主义”这一主题展开。其中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再思考》回答了针对《东方主义》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批评。除了重申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的基本主张外，赛义德也对自己早期的思想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例如他更多地注意到与殖民话语对峙的反话语的存在，也更明确地承认早期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家如法依、赛萨尔等人思想遗产的价值。余下的四篇文章里面，詹姆斯·克利福德的《论东方主义》，对该书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波特的《东方主义及其问题》与阿赫默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后》则从不同的角度对《东方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波特指出赛义德未能觉察到他依赖的两种学说，即福柯的话语理论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潜在矛盾，未能认识到东方主义话语内部的复杂性，如文学作品与意识形态的疏离性等，阿赫迈德则分析了《东方主义》一书所从出的历史语境，并批评赛义德只注意到种族，而未能对另外两个范畴，阶级与性别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一文的作者德里克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提出了“东方人的东方主义”问题，并紧扣中国历史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相信这篇论文会引起

中国读者更大的兴趣。

本书第二部分收录了六篇论文，其中包括另外两位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与霍米·巴巴的四篇代表作。斯皮瓦克的长篇论文《属下能说话吗?》被认为是她最有影响的著作。属下（Subaltern）一词也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葛兰西用这个概念来描绘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社会集团，除了“从属”、“低一等”的意义外，这个概念还特指那些被压迫被剥削但又并不拥有一般“阶级意识”的团体。一批以古哈为首的，被称作“贱民研究集团”的印度历史学家希望为“属下”重写历史，斯皮瓦克这篇论文部分就是针对他们的。斯皮瓦克指出，属下实际上是不能说话的。她以印度妇女的“撒提”（Sati）为例，寡妇殉夫在过去印度的历史著作中有两个句子来表现，一是“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这是白人殖民者的表述，另一是“妇女实际想要死”，这是本土父权制的捍卫者的表述，而“在这两种情形下属下妇女的声音都是无法听到的”。斯皮瓦克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representation”一词的用法进行了辨析，这个词在德文和英文中都有两种意义，一是“再现”，一是“代表”，但在政治实践中，二者常常混淆，当我们自以为是在“代表”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过是在“再现”。你以为你是代表属下阶级，作他们的代言人，实际上你作的只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斯皮瓦克指出，这就是德鲁兹、古哈等人错误的症结，也是我们最终难以听到属下声音的原因。在这里，她尖锐地提出了批判主体的非代表性问题。在她的另一篇论文《三个女性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斯皮瓦克从后殖民主义立场重读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如《简爱》，并提出了自己新颖独到的阐释。这篇文章代表了其后殖民理论的另一个侧面。霍米·巴巴是所谓后殖民主义“三剑客”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思想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主要关注殖民话语，尤其是殖民话语中呈现的复杂心理关系的分析；在第二阶

段，他探讨的问题有，当代条件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境遇，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献身理论》发表于1988年，恰恰处于两个阶段的转折点上。这篇文章企图回答人们对后殖民理论的一项批评，即后殖民理论家声称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但同时自身又严重地依赖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文章中，芭芭强调，应当把西方批评理论的制度史和它的概念中潜在的变革因素区分开来。同时他还着重阐发了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谈判。芭芭的另一篇论文《纪念法依：自我、心理和殖民条件》，则依托法依早期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的某些思想，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所谓“主体暧昧”的观念。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中，斯皮瓦克和芭芭都以文风晦涩著称，这几篇文章也反映了这一特点。斯皮瓦克和芭芭的观点，遭到另一些后殖民理论家，如詹穆罕默德、帕里、阿赫默德等人的激烈批评。这里我们选录了帕里的《当前殖民话语理论的若干问题》和阿赫默德的《文学后殖民性的政治》两篇文章，我们希望这些文章之间的交锋能够构成一个“话语场”，通过这个“话语场”我们不仅能够听到来自后殖民理论内部的不同声音，而且能够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辩难，对后殖民理论涉及的若干基本问题有一个更深入、更完整的了解。

本书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文化抵抗”。这部分收录的文章历史跨度最长。法依是后殖民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先驱。《论民族文化》选自他六十年代的著作《地球上不幸的人们》，这是他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法依在这篇论文中强调，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具体地勾勒了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他把第三个阶段称为“战斗阶段”。在这一阶段，民族文化的使命是“成为人民的唤醒者”。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法依思想中的另一个方面，用赛义德的话说：“法依是第一个重要的反帝国主义思想家，意识到保守的民族主义仍然遵循着帝国主义开辟的同样的轨迹……讲述一个简单的民族故事，不

过是重复、扩展，也是产生新的帝国主义形式。”^① 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法依还反对自我孤立，闭关自守，强调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蕴含和相互联系。他说：“今天每一个人的未来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存在着一种紧密依存的关系。”^②正是这些辩证的观点，使他的思想在当代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尼日利亚小说家阿契贝的《殖民主义批评》也是后殖民主义思想史上一篇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著作。这篇论文发表于七十年代。在文章中，阿契贝揭露西方批评家用所谓文学普遍性的观点来包裹自己文学的民族性，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批评。在这组论文中，还有一篇值得认真推荐，这就是阿赫默德的《詹姆逊的他性修辞和“民族寓言”》。这篇论文是专门批驳詹姆逊的文章《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的。詹姆逊这篇论文在九十年代初已有中译本，在中国发生过广泛的影响，相当多的学者是把它当作后殖民主义的经典来阅读和介绍的。在这种背景下，读一读阿赫默德这篇文章会是很有启发的，同样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提出像阿赫默德那样义正辞严的诘问，相反却对之趋之若鹜呢？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阿赫默德这篇论文后来被英国学者伊格尔顿收入他编选的一部相当精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读本，与卢卡契、布莱希特、阿多诺、本雅明，包括詹姆逊本人的著作并列，阿赫默德是这部读本的众多作者中唯一的一位非西方人。

本书的第四部分共收入五篇论文，前三篇讨论反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系，后两篇探讨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无疑，这两方面的探讨都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弗洛伊德曾把妇女比喻作“黑暗的大陆”。这个比喻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在白人男性心目中，在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他（她）们都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都被白人男性看作是异己的他

①② 巴特·摩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第13、14页，1997年英文版。

者，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合力，二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交流 and 对话。这种对话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再认识和再发现。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是白人女性，而男性的后殖民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关注的是第三世界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境遇始终处于理论视野之外。本书选编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第三世界妇女的主体、身份和历史。其中，胡克斯的文章，集中探讨了黑人女性的主体建构问题；莫汉蒂的著名论文《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与殖民话语》，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卡特拉克的文章《非殖民化文化：走向一种后殖民女性文本的理论》则试图从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思想资源中寻求支持，以期建立一种适应第三世界妇女文本的理论模式和阐释策略。她们所代表的理论方向被一些学者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这是后殖民主义中生机勃勃的一支力量。关于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后殖民主义究竟是后现代主义在全球范围，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延伸，还是一种与后现代主义相抗衡的力量，答案不一。本书选编的两篇文章，都是在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述，所不同的是，阿皮亚的文章以非洲作为立论的依据，而琳达·哈琴的文章主要依赖加拿大的文学经验，这种差别是否也证明了后殖民经验本身的异质性呢？

最后，在这篇简短的“前言”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后殖民主义仍然属于西方思想界内部的一种派别，但与我们过去接触的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却有一点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是超越西方的，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假如说我们对前一时期西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争论还能采取一种较为超然的隔岸观火的态度，那么今天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占领，有着屈辱的半殖民地经验

的民族来说，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如果我们编选的这部书，能够在推动中国思想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后殖民主义讨论，并进而在这场讨论中发出自己宏亮而独特的声音方面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的话，我们就十分满足了。

罗 钢 刘象愚

1999年春节于北京